

德

阿尔诺·格鲁恩

著

李健鸣

译

同情心的

丧失

经济日报出版社

同情心的丧失

[德] 阿尔诺·格鲁恩 著
李健鸣 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德

阿尔诺·格鲁恩

著

李健鸣

译

同情心的

丧失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情心的丧失 / (德) 格鲁恩著; 李健鸣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10

ISBN 7-80127-736-8

I. 同… II. ①格…②李… III. 同情—研究 IV. C912.6

中图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6910 号

Arno Gruen

Der Verlust des Mitgeföhls

Über die Politik der Gleichgültigkeit

©1990, 1997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Munich/Germany

同情心的丧失

著 者	[德] 阿尔诺·格鲁恩
译 者	李健鸣
责任编辑	钱大川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63567683 63538621 (发行部) 63567687 (邮购部)
网 址	edp.ced.com.cn
E - mail	edp@ce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736-8/B.2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什么是人的问题

同情心的问题与什么是人的问题和人的同一性问题有关，同时也与下面的问题有关，即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多大程度的伤害之后仍还能坚持人性。

奥斯威辛集中营向世人发出警告，它让我们看到没有同情心的人会堕落到何等地步。普里默·列维在题为《这还算
是人吗？》（1992）这篇有关奥斯威辛的报道中写道：他感到羞愧，因为居然有人想出并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奥斯威辛既不是第一次让人类感到羞愧，也不是最后一次。最早引起人类羞耻感的是古希腊对儿童的残害，一直到今天这类事还在发生，如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残害妇女和儿童的暴行还时有发生，也经常会出现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和青少年之间的殴斗。现代社会政治现状的特点是：一方面官僚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人类在不断地发泄极度的愤怒。

为什么今天在世界各地，经济的崩溃、衰退、战争、破坏、仇恨、兄弟反目、暴力、吸毒、犯罪、对妇女和儿童的歧视、野蛮和残暴行为日益加剧了呢？难道出现这一危机的原因仅仅是国家、经济和技术的问题？不，这一危机涉及到

人的定义，涉及到我们自己对人的理解。我们自豪地声称我们生活在“文明”之中，但是控制这一文明的法律和权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危及我们身心健康的机制。

那么，为什么不从我们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呢？为什么生活在信息社会并有很高的科学认识水平的我们，却又一次落后于历史呢？今天，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与人的依赖性越来越紧密，但同时相互敌对的气氛也日益增长。为什么人会反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反对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呢？

有关什么是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范畴。奥斯威辛向世人发出警告，提醒我们人会恶到何等程度，当然它也有权利提出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很难对此作出回答。我们的现实要求以及形成我们的自我理解和意识的东西都是服从于社会制度，也就是说，都是由外界的事物所决定。下面我试图要说明的是存在着迫使我们把权力和服从看做是我们的自我目标的势力，结果造成了我们本来向往温暖和爱的要求离我们远去，甚至被我们所否认。这些脱离我们的要求被充满破坏欲的经验所取代，这些经验导致了个人的分裂。

许多人在回答什么是人的问题时，会提到人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果以此来定义人的话，就会把人同社会角色和符号等同起来。一旦发生社会变革，出现经济和政治的混乱，这些定义就会不起作用，因为人扮演的角色会逐渐失去其意义。这时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们就会惶惶不安，不知道他

们置身于何种地位并感到受到威胁。有些人就会试图强行恢复过去的状态，因为他们认为旧状态会带回他们失去的同一性。历史学家们提到过失去同一性和重新产生同一性的历史阶段，但他们没有提出过人的同一性是否真的产生于社会角色的问题。但这样的一个定义是排斥了我们做人的真正含义，而只把人局限在人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即维持权利和服从的那部分。

尽管如此，对人的这种定义占据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我们的思维。但如果我们把人的同一性与人的认同混为一谈，我们就不得不把民族主义也看做是人的同一性的表示。我们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民族主义会演变成暴力、对弱者——妇女和儿童的欺凌、谋杀和战争。我们通过接受这种民族主义的同一性，就会使自己对此俯首贴耳，就会成为这种同一性的牺牲品。

同一个国家及其风俗的认同，参与共同的经验、希望、快乐和悲伤肯定会使人有一种从属感和安全感。我们是社会的成员，为了身心的成长需要其他的人。但是出于一种认为自己有缺陷而与权力认可的做法就会导致人失去同情心。

能说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法西斯主义，不管其来自于右倾还是左倾。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团伙或在军队里找到自己位置的人通过对权威符号的认同而愿意服从命令，他在这种认同中感受自己的同一性，目的是通过有组织的或虚无主义的暴力使自己得到发泄。一个把自我责任心移交给上级组织的人是一个异化的人。他会被冲动的情感所俘虏，这些情感

脱离了本源，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经验。那些从认同权力和权力符号中获得同一性的人失去了做人的基础，他们的自我理解会有助于维持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从而也就开始了一个怪圈。

还有一种危险是来自于“官僚化”的人物，这些人用义务来取代良心，用与权力的认可来取代自己的同一性。这样在很高的组织层面上就会发生暴力和谋杀行为，而且又都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但这样做事实上仅仅是为了掩盖同情心的异化。

同情心是我们内心抵御非人性的堡垒。我们的文明史不仅同压制和扭曲同情心交织在一起，而且对同情心的压榨和扭曲也是文明史的基础。这本书的宗旨就是要介绍同情心的历史、其发展和命运。

目 录

前言：什么是人的问题	(1)
一、受害者和肇事者的问题	(1)
二、论童年史与童年	(11)
三、我们的同一性	(24)
我们如何对失去同情心进行补偿	(24)
为什么我们需要敌人	(26)
意识的形成	(27)
意识取决于自我发展的方式：我们的孤独所 造成的生存苦难	(34)
男女之间的争斗是不健全自我的体现	(38)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对男人的这种简化 意识作出的评论	(39)
四、语言、意识、左半球和右半球	(43)
五、被异化的身体	(56)
六、恐惧与失去同一性	(63)
七、无动于衷的现象	(72)

八、自恋与同一性	(79)
自恋	(79)
同一性	(82)
九、与压迫者的认同：我们文明的基础	(85)
孤立无援的早期经验导致对死亡的发现	(85)
规定界限和破坏界限	(88)
学习	(90)
破坏界限的一些例子	(94)
恐惧感转换成安全感	(99)
把怒气针对自己	(101)
用求生策略来对抗不被承认	(103)
十、道德性与人性	(107)
不可忍受的罪责感	(107)
罪责与羞愧	(115)
良心和超我	(120)
孩子如何承受负罪感：案例	(122)
受害者与负罪感	(130)
十一、反对爱是基本罪行	(135)
惩罚	(135)
羞愧	(140)
羞耻感和自我背叛：案例	(146)
父母的爱是绝对的神话	(152)
十二、用当受害者来掩饰死亡	(156)
十三、关系和联系不可同日而语	(164)

反叛者和顺从者·····	(169)
左翼和右翼反叛分子·····	(172)
十四、理想和理想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177)
十五、我们的孩子及黑白颠倒：真理即恶，谎言 即善·····	(182)
十六、科学与原始·····	(192)
原始·····	(192)
矛盾性·····	(199)
原始并不等于天堂·····	(200)
科学体现了我们与自己的异化·····	(201)
从精神病生理学的角度谈发展概念·····	(207)
科学及其对痛苦的否认·····	(213)
十七、我们的恐惧与原始民族的恐惧不同·····	(221)
十八、我们的历史意识·····	(227)
十九、德斯普雷斯与幸存者：尊严和非存在是幸存的 原因·····	(231)
关于人和精神分裂的讨论·····	(231)
反对绝望是争取自我的斗争·····	(235)
幸存者与精神分裂者·····	(242)
再论幸存者、精神分裂病人、原始民族、科学 与政治·····	(247)
二十、与非存在的抗争：病人自己保护自己·····	(256)
与非存在的抗争·····	(256)
病例·····	(260)

阿尔金·····	(260)
多里斯·····	(261)
汉斯·····	(262)
爱娃·····	(263)
芭芭拉·····	(274)
二一、以幻觉的方式占有病人·····	(277)
现实“是一个人的死亡”：一个案例·····	(283)
一个文学上的例子·····	(285)
二二、成为牺牲品是生命的意义和我们暴力行为的 基础·····	(288)
牺牲品：范例·····	(288)
贝拉·····	(288)
阿克塞尔·····	(290)
詹姆斯·····	(292)
当牺牲品是暴力的基础·····	(292)
二三、非爱与非同一性：社会后果·····	(294)
好母亲和坏母亲·····	(294)
我们总是在错误的人身上寻找我们的满足·····	(299)
从社会的角度提出一些结论·····	(302)
二四、什么是历史？应该怎么做？·····	(305)
鸣谢·····	(307)

一、受害者和肇事者的问题

如果不允许一个人体验痛苦，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被人看成是弱者而不能体验痛苦，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其他生命的身上寻求痛苦。一个这样的人会欺侮和折磨他人，以得到被自己排除和否认的痛苦。同时他又会否认他的所作所为，以掩饰他自己灵魂的扭曲。但这样的否认会把受害者变成肇事者，此外还能导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区分受害者和肇事者。受害者会被看做是肇事者，肇事者会被看做是受害者。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是我们文化的特点。

我们的文化教育孩子（男孩比女孩更甚）要为自己掉眼泪、为自己的绝望和灵魂的受伤而感到羞愧。正因为我们被迫要否认痛苦，所以我们也就不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痛苦。出于同一个理由，我们也不愿意感受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可以举出许多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在利物浦，两个 11 岁的男孩（本身也是冷漠家庭的牺牲品）绑架并杀害了一个两岁的男孩（见 1993 年 11 月 25 日《苏黎世日报》）。对 27 名证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如果行人及时加以阻拦的话，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流血事件的。这些行人虽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但没有人出来干预。由于他们对受害者的苦难不闻不问，事实上就站到了肇事者一边。

当年对罗马尼亚人民进行残酷镇压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的兵源是孤儿。这些孩子一直缺乏爱和希望，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也是靠成功地压抑自己的痛苦，就是这些孩子被有计划地培养成杀人凶手。

约翰内斯·古尔德和斯特凡尼·兰德格拉夫的电影《被剥夺的童年》讲述的就是莫桑比克一群 10 岁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被所谓的莱那莫叛军组织所绑架、强奸，然后又把他们训练成像机器人那样去杀人。影片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建立在服从和恐怖基础上的极端的社会化过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些压迫者通过惩罚扼杀了孩子的恐惧、对伤害的敏感和羞耻心，从而把孩子变成他们的工具。更有甚者：孩子通过给别人带来痛苦，从而使自己从这种不能自我感受的痛苦中得到解脱。

下面的例子（1994 年 2 月 11 日《苏黎世日报》）说明了这样的机制是如何悄悄地起作用的。一个 77 岁的男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下来，一个正在和司机说话的男人挡了他的路。那个老人拔出手枪，在两三米的距离外朝这个男人开了四枪后就消失了。四星期后，这个枪手偶然被人在一家饭店认出并遭到逮捕。他否认他曾开过枪，但身上带着一把没有许可证的枪。警察在搜查他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武器库，后来他承认是他开的枪，但他强调他是在被那个人惊吓后因为情绪激动才开的枪。

法院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然后又中断了调查。负责这个案子的女检察官认为当时这个 77 岁的老人是处于一种“不

能辨别事实”的状况，所以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他受到威胁，所以有权进行反抗。女检察官说他“对侵略性的语言和行为有过激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那个受害者问一名新闻记者：“我到底做了什么？他怎么能对我开枪呢？”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位女检察官的“同情心”呢？她为什么站在肇事者那边，而不去保护市民呢？她的态度是不是表示了允许每个人都去杀人呢？这种违背我们的要求和利益的同情心，让我们对受害者的痛苦不闻不问的同情心，这种否认肇事者会带来致命危险的同情心到底是什么？那个女检察官肯定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她把肇事者的杀人行为看做是合理的，从而就忽视了受害者的苦难。她无法感知受害者的痛苦，但却在肇事者的惊吓中发现了他的痛苦。

这一例子可怕而又典型地说明了一个无法承认自己痛苦的人也就无法感受别人的痛苦。如果她真的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她就会回忆起她自己的痛苦。正因为她不能这么做，所以她就会对肇事者表面上的痛苦产生同情心，而避开受害者的真正痛苦。不允许感受自己所经历过的痛苦导致了否认其他人的痛苦。

到处都可以看到对真正痛苦的否认。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在一篇文章里抱怨道：一个搞文化批判研究的学者对一个杀死她小儿子的母亲不予同情。这个母亲在儿子的胸口上几乎坐了两个小时，以惩罚他玩火柴和从厨房的柜子里拿走了五美分。小男孩 10 岁的姐姐听到弟弟的喘息声就去叫来了警

察。几天后，男孩死于窒息造成的脑损伤。陪审团的裁决是这个母亲“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无情的人”。上面提到的那个遭到批评的学者在他研究里批判了这种变异的同情心。

对凶手表示同情或欣赏的例子并不鲜见，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这可能是媒体，也可能是学术界或宗教界人士的作为，但这些人从来也不会对受难者的家属说一句表示哀悼的话。

上面提到的那个心理分析学家也属于变异同情心的捍卫者。这些人都认可肇事者，而否认受害者的痛苦。真正的同情心被排除了，因为他们轻视自己内心的那个受害者。

总的说来人们都认为他们是能自由思考的，是能作出有批判性的和“有科学根据”的判断，特别是那些认为自己是进步的或属于具有革命思想群体的那些人。但是，从属于某个群体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思考不按预先已设置好的程序进行，这一程序就是在内心否认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之所以把它称之为程序，是因为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传递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我们把痛苦禁锢在我们的内心，就使得我们无法对受害者开放，而是同情肇事者。

当然，肇事者也是牺牲品，但他们同牺牲品的区别是：他们最憎恨并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是牺牲品，而且他们还必须把其他人变成牺牲品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如果我们能认清肇事者的真面目，我们就不会同情他们。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同情只能帮助他们加强他们的自我同情心，他们

以这种自我同情心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而真正的同情心不是为了加强肇事者对自己行为的首肯，而是要让人们认识到回归人性的道路必须是要面对自己过去所遭受的痛苦。

在某种意义上，尤迪特·莱维斯·赫尔曼在题为《暴力的伤痕》（1993）一书中有关创伤经验的内容是正确的。她认为对心理创伤的研究需要政治运动的支持。在提到最能说明什么是受害的性创伤时，她写道：“要让研究性和家庭范围的创伤事例合法化，前提是要对妇女和儿童的受歧视地位提出怀疑。”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认识不到使妇女和儿童变成牺牲品的社会框架条件，也就认识不到妇女和儿童的创伤。”赫尔曼认为，一个强大的人权运动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运动，“否认这些现象就会占上风，而不是积极地去探讨这个问题”。其后果就是否认、排除和不承认心理创伤。

但赫尔曼没有看到，仅依靠人权运动是没有用的。我们首先要有自己也是牺牲品的意识，然后再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点。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就认识不到摆脱旧权威结构的必要性，从而就会从属于一种具有新名称的新权威。我们只有认识到对权威的认同必须以否定自己的痛苦为前提，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摆脱对肇事者的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恐惧。

赫尔曼借助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观点。法国脑神经专家让·马丹·沙尔科是第一个治疗受过创伤的病人——大部分是女病人——这些病人在巴黎的萨尔佩特列尔医院找到了躲避暴力、剥削和强奸的避风